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汤仁泽
编

谭嗣同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汤仁泽
编

谭嗣同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谭嗣同卷/汤仁泽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300-19947-4

I. ①中… II. ①汤…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谭嗣同 (1865~1898)-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7486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谭嗣同卷

汤仁泽 编

Tan Sitong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30.5 插页 4	定 价	72.00 元
字 数	488 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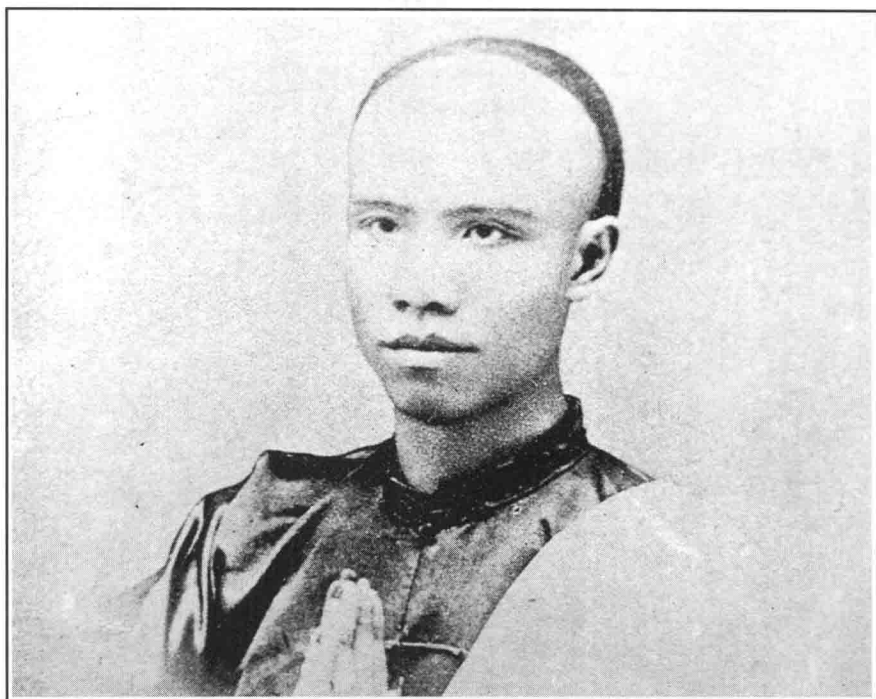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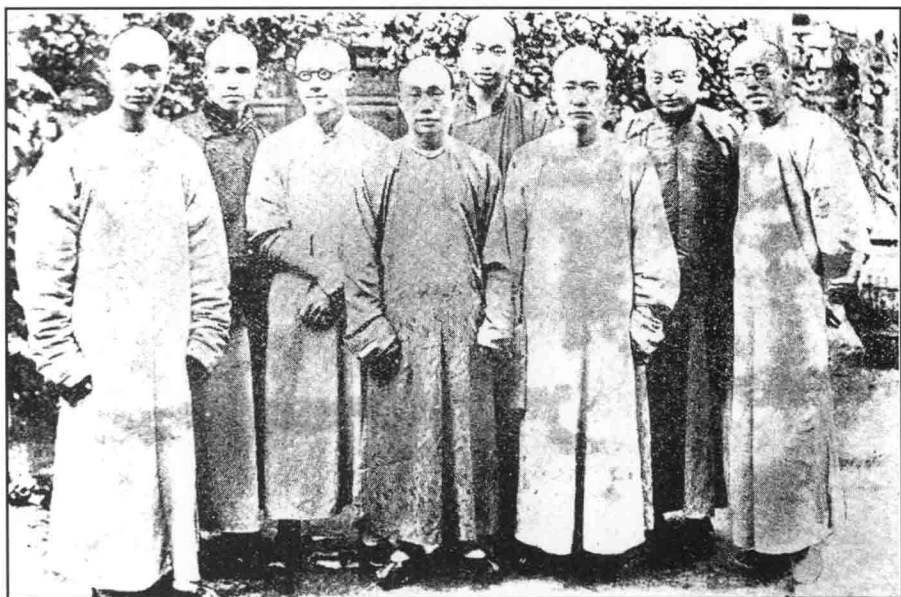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谭嗣同像



譚嗣同像



(光緒戊戌
春夏間攝)

叶觉迈

譚嗣同

王史

欧渠甲

韩文举

唐才常

李维格

湖南时务学堂总理及教习合影

譚嗣同全集

海鹽張元濟題

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三联书店 1954 年版）



陈乃乾校订：《譚浏阳全集》（附续编）（上海文明书局 1917 年版）

欽憲世伯大人閣下 鑒師有回信否處
此間榴差頻廿日以後方能行
瀏陽近有大煤礦能用土法開
採而無多之人為檢認真唐級也
拔負才帶即其一也頃接唐信
云由該處之煤運來二百二十二石
款不錢政局試驗是否合用否信
一併呈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 1840 年至 1949 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提起谭嗣同，人们总会想起他血洒刑场前的从容不迫，也会想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勇气概。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与其他五位志士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遇害，“就义之日，观者万人”，谭嗣同“慷慨神气不少变。……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①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一号华相众生，一号东海寰冥氏。他的祖先原居住在福建省清流县，后迁至湖南长沙。明末，七世祖濬轩公（讳世昌）为避乱，自长沙迁于浏阳，遂为浏阳人。曾祖经义，字镇方，号矩斋，累赠光禄大夫，教授乡里，以义称于时；妣氏李。祖学琴，字步襄，别字贵才，国子监生，以子继洵贵，累赠光禄大夫；妣氏毛，讳开，累赠一品夫人。父继洵，字敬甫，光禄大夫，赐进士出身。

母亲徐五缘，浏阳国子监生韶春之女，年十九适继洵，“归谭君也，食贫者十余年，随于京师者十余年，佐夫治家，条理毕具”^②。早在七岁时，母亲挈伯兄嗣贻返浏阳就婚，谭嗣同送母至卢沟桥，“目泪盈眶，强抑不令出”。返家后，因受庶母歧视，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整日沉默，忧郁成疾。十一岁时，父亲谭继洵由户部员外郎升任郎中，在通州任职，全家迁入京城。第二年京城发生白喉传染病，母亲和大哥嗣贻、

① 梁启超：《谭嗣同传》。（凡著录本书的引文，不标明页码，在书内皆能查阅，下同。）

② 谭嗣同：《先妣徐夫人逸事状》。

二姐嗣淑都被感染，不治身亡。“是岁亲属歿京师者六人”^①。谭嗣同染疫死去三日后苏醒，所以父亲给他起了个字叫“复生”。“一旦失庇荫，未尝不或流涕思之”，家庭的不幸，在他幼小心灵处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仁学·自叙》这样写道：“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任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梁启超说他：“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②谭嗣同自小在特殊的环境中长大，养成了刚强坚毅的性格。

十三岁时，父亲补授甘肃巩秦阶道，谭嗣同跟随父亲到了西北地区，观赏到“烟消大漠群山出，河入长天落日浮”^③、“远天连雪暗，落日入沙黄”^④的壮观景象。以后几年内，多次往来于直隶、陕西、甘肃、湖南、湖北、山西、安徽、江西、江苏等地，观察社会风情，了解民众疾苦，发出“露草逼蛰语，霜花凋雁翎。但忧悬磬室，兵气寓无形”^⑤的担忧和感叹，激起了对清政府腐败统治的不满和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忱。

在游历名山大川的过程中，谭嗣同对书本知识作实地考察，辨别真伪。《毛诗》说“泾以渭浊”。孔颖达疏曰：“泾水以有渭水清，故见泾水浊。”朱熹沿袭其说，曰：“泾浊渭清”。他则相反：“泾清渭浊”。谭嗣同多次途经甘肃，亲临泾、渭，“留心觐之”，探究后明白了两河在不同时期的清浊变化：“当泾涨渭涸，则‘泾浊渭清’；泾涸渭涨，则‘泾清渭浊’。”

十九岁，与李闰结婚，妻子贤惠，谭嗣同曾赞道：“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⑥

二

五岁时，谭嗣同在京始与仲兄嗣襄师从毕莼斋读书，读《三字经》、

① 陈乃乾：《浏阳谭先生年谱》，3页，见《谭浏阳全集》（附续编），陈乃乾校订，上海，上海文明书局，1917。

② 梁启超：《谭嗣同传》。

③ 谭嗣同：《和景秋坪侍郎甘肃总督署拂云楼诗二篇》。

④ 谭嗣同：《白草原五律》。

⑤ 谭嗣同：《武昌夜泊二篇》。

⑥ 谭嗣同：《戊戌北上留别内子》。

《千字文》等。八岁时，与伯兄嗣贻、仲兄嗣襄读书京师宣武城南，拜韩荪农为师。十岁起，从湖南名儒欧阳中鹄读书。欧阳先生推崇王夫之（号蘊斋，一号船山，湖南浏阳人），自号瓣蘊，取瓣香蘊斋之意，谭嗣同开始接触王船山的思想。十三岁那年，与同县唐才常相识，两人共师事欧阳中鹄，结下同生死，共患难的“刎颈交”。十六岁时，拜同乡涂大围为师。谭嗣同师从欧阳中鹄、涂大围，有系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学习算学及格致之类的自然科学，这些对其思想的形成有较大影响。

二十岁后，谭嗣同曾多次应试，均落第。二十八岁时，博览清代学者著作，尤其嗜好甘泉、焦循关于易学和数理的著作。次年在京师结识吴季清、吴樵（铁樵）父子，对自然科学产生兴趣，购买了当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自然科学和广学会翻译的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和耶稣教神学等书籍阅读，努力学习西方文化。

谭嗣同自述“二十学文”，初学桐城古文，后好魏、晋骈文。“少颇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久自以为似矣；出示人，亦以为似。……稍稍自惭，即又无以自达。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揣摩，益笃耆之。由是上溯秦、汉，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子云所以独辽辽焉。”^①在三十岁以前，已完成诗文著作十六种二十四卷。

谭嗣同生活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1894年他三十岁，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战败，“世变日亟”，“天朝上国”竟被“蕞尔小国”——日本击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奇耻大辱极大地震动并唤醒了国人，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形成强烈的变法维新思潮。谭嗣同在时局的刺激和维新思潮的推动下，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谭嗣同这样写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沧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②他决心告别过去，抛弃旧学，干一番事业。1896年，听说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强学会，慕名往访，见到梁启超、麦孟华等志同道合者，“始备闻一切微言大义，竟与嗣同冥思者十同八九”^③。

① 谭嗣同：《三十自纪》。

② 谭嗣同：《题江建霞东邻巧笑图诗》。

③ 谭嗣同：《治事篇第十·湘粤》。

三

1898年2月至4月，南学会在长沙开讲，谭嗣同作《论中国情形危急》演讲，“愿与诸君讲明今日危急情形，共相勉为实学，以救此至危急之局……夫日本席全盛之势，犹时恐危亡，忧及我国，我何可不自危而自振乎？”^①又与唐才常在长沙创办《湘报》，按日刊行；与熊希龄等组织延年会；与黄遵宪、唐才常等发起湖南不缠足会；湖南延年会在长沙成立，谭嗣同撰《叙》及《章程》等。在1898年4月23日《湘报》第四十二号上呼吁：“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当牛马之日不远矣。”“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无过于学会者”^②。通过办学会，可以培养和团结一批通晓中、西学的知识分子，组织起致力于维新事业的骨干力量，从而“结群力厚”，以开风气而挽世变。

6月11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

9月5日，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参预新政事宜。章京品级虽不高，却是光绪帝在军机处推行变法的得力助手。

18日，光绪帝命林旭传出“密诏”，令康有为“即速出外”。晚间，谭嗣同赴法华寺造访袁世凯，劝说袁世凯勤王，杀荣禄，除旧党。谭嗣同“尽以密谋告袁”，“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

19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回宫。21日政变发生，重新“训政”，废除新法。

政变发生后，京城及各地大肆搜捕维新人士，大难随时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梁启超劝谭嗣同出走，谭嗣同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康）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梁启超劝他一起去日本驻华使馆暂避，再谋出国，以图维新大业的复兴。谭嗣同执意不从，说自己受皇上恩宠，理应酬圣主的恩泽。

谭嗣同“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未至，“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篋”交给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

① 谭嗣同：《论中国情形危急》。

② 谭嗣同：《谭复生观察南学会第八次讲义》。